

共识与博弈：索马里邦特兰政治发展的双重路径^{*}

崔媛媛

内容提要 在索马里整体动荡背景下，邦特兰地区成为“稳定孤岛”，其发展路径具有独特研究价值。通过系统分析邦特兰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互动策略，可以发现该地区稳定发展的内核在于双重战略的系统实践：对内构建以部落推举为基础、议会间接选举为路径的共识型政治，通过权力分享机制平衡氏族利益、化解内部冲突；对外则在联邦格局中扮演战略行为体角色，借助合作与制衡策略保障自治权并扩大区域影响力。邦特兰双重战略的成效关键在于单一部落主导的社会结构、历史积淀的治理经验及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然而，邦特兰地区发展也面临精英固化、社会包容性不足及外部关系不确定性等挑战。邦特兰治理实践为理解索马里的局部稳定提供了新视角，其经验为深陷治理失效与冲突困境的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路径。

关键词 索马里 邦特兰 部落政治 权力分享 政治治理

作者简介 崔媛媛，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昆明650500）。

索马里全境持续动荡，邦特兰地区却保持相对稳定，形成非洲之角独特的政治地理格局。安全方面，索马里南部与中部面临“青年党”和“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的双重恐怖主义威胁；邦特兰则在美国和阿联酋支持下开展反恐军事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撒哈拉以南非洲部落冲突问题及对中非合作的影响研究”（编号：25CG100）、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索马里邦特兰地区半独立问题研究”（编号：2025J0196）和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动并取得一定成效。^① 治理方面，2024 年联邦政府通过宪法修正案试图收回税收权，引发各地抵制并导致国内关系紧张；^② 邦特兰则于 2024 年初顺利完成选举，实现权力平稳过渡。^③ 经济方面，联邦政府严重依赖国际援助，2025 年上半年美国削减非军事援助后经济陷入困境；^④ 邦特兰则依靠渔业出口、跨境畜牧业贸易和国际投资建立起自给型经济圈。社会结构方面，索马里传统氏族制度在南部成为冲突催化剂，达鲁德（Darod）和哈维伊（Hawiye）等部落争夺摩加迪沙控制权导致暴乱频发；邦特兰则实现氏族制度现代转型，维持部落间平衡。^⑤ 国际关系方面，联邦政府持续接受美国政府价值评估；邦特兰则通过非对称外交拓展空间，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⑥ 在此背景下，研究邦特兰地区实现并维持相对稳定的核心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学界长期关注索马里国家构建问题，已有较深入的系统分析。^⑦ 但国内学界针对邦特兰的研究较为薄弱，国外虽有不少探讨，也存在一定不足。部分研究将邦特兰稳定归因于外部安全支持等单一因素，如强调美国无人机情报合作和阿联

- ① Daisy Muibu and Yayedor Mbengue, "Somalia at a Crossroads: Resurgent Insurgents, Fragmented Politics, and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USSOM," *CTC Sentinel*, Vol. 18, 2025, pp. 2 - 3; 王涛、赵跃晨:《泛索马里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兼论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世界民族》2018 年第 4 期,第 40—52 页。
- ② "Somalia's Puntland Refuses to Recognise Federal Government After Disputed Constitutional Changes," Reuters, March 31,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somalias-puntland-refuses-recognise-federal-government-after-disputed-2024-03-31/>, accessed May 7, 2025.
- ③ "Lessons from the Missed Opportunity in Puntland's Pol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rch 12, 2024,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horn-africa/somalia/lessons-missed-opportunity-puntlands-polls>, accessed May 7, 2025.
- ④ *Impact of US International Aid Suspension Somalia*, Somalia NGO Consortium, 2025, pp. 1 - 3; "4.4 Million People in Somalia are at Risk of Hunger Amidst Unprecedented Cuts in Humanitarian Funding," Danish Refugee Council, March 13, 2025, <https://drc.ngo/resources/news/4-4-million-people-in-somalia-are-at-risk-of-hunger-amidst-unprecedented-cuts-in-humanitarian-funding/>, accessed May 10, 2025.
- ⑤ "The Institute at 10 - Democracy New and Old: Averting an Electoral Crisis Somalia's Puntland State," European Institute of Peace, April 30, 2025, <https://www.eip.org/the-institute-at-10-democracy-new-and-old-averting-an-electoral-crisis-in-somalias-puntland-state/>, accessed May 10, 2025.
- ⑥ 孙红、高群博:《三重危机叠加,索马里艰难》,《世界知识》2024 年第 11 期,第 58—59 页。
- ⑦ 韩志斌、邢昊:《索马里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部落问题——以国家建构关系理论为视角》,《世界民族》2021 年第 2 期,第 84—91 页;邢昊:《论身份政治在索马里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及其影响》,《非洲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41—58 页。

酋军事援助的作用，但未解释这些外部资源如何转化为地方治理能力。^① 现有研究多聚焦特定时间点的稳定状态，缺乏对邦特兰稳定发展的演进脉络、关键转折点及外部冲击适应机制的动态分析。^②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既未构建多维度关联机制，如外部援助如何通过内部治理转化为稳定效能，也未建立时间维度的演进逻辑，如稳定从外部依赖到内生韧性的过渡阶段。这导致难以全面解释邦特兰稳定的成因与可持续性，而未能阐明其稳定的特殊性，就无法为索马里其他地区或类似冲突后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治理范式。由此，本文聚焦邦特兰治理策略如何维系地区稳定，通过重新审视其政治发展历程，为后冲突部落社会的治理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参考。

索马里邦特兰的历史根源

邦特兰地区的社会秩序、政治轨迹与部落历史紧密相关。要理解该区域形成达鲁德部落核心认同格局、延续传统冲突调解机制的原因，需回溯三条关键历史脉络：一是从萨马勒（Somale）与萨卜（Saab）族系的起源传说、通婚差异及迁徙历程，揭示达鲁德部落如何奠定邦特兰单一部落主导的社会基础；二是从前殖民时期围绕资源纠纷形成的长老调解、氏族大会等机制，到殖民时期联合抗敌的集体行动，揭示协商与凝聚的政治文化如何积淀；三是从索马里独立后哈维伊部落、达鲁德部落因政权垄断引发矛盾，以及巴雷政权因部落利己主义最终崩溃的教训，揭示邦特兰治理逻辑中对赢者通吃模式的规避。这些历史脉络为解析邦特兰社会结构与政治逻辑提供了历史支撑。

（一）社会基础：单一的部落构成

索马里人主要分为萨马勒和萨卜两大族系。^③ 9 世纪后，随着家族繁衍及皈依伊斯兰教，索马里人开始与阿拉伯人通婚。11 世纪，穆斯林教长谢赫·达鲁

^① Ido Levy, "How the Small Autonomous Region of Puntland Found Success in Battling Islamic State in Somalia," *The Conversation*, April 7, 202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the-small-autonomous-region-of-puntland-found-success-in-battling-islamic-state-in-somalia-251775>, accessed May 15, 2025.

^② Abdiqani Haji Abdi, "Implications of Somalia's Current Turmoil on Puntland," *Wardheernews*, December 3, 2024, <https://wardheernews.com/implications-of-somalias-current-turmoil-on-puntland/>, accessed May 15, 2025.

^③ 据传说，8 世纪中叶，一位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来到索马里北部海岸与一位盖拉族（Galla）女子结婚，并生下“萨马勒”和“萨卜”，即索马里两大族系的始祖。因此，两族系是同宗兄弟关系。

德·贾巴尔蒂 (Shaykh Darod Jabarti) 来到索马里，与当地迪尔索马里人 (Dir Somalia) 族长的女儿杜比拉·迪尔 (Doombira Dir) 结婚，其后裔形成萨马勒族系的达鲁德部落。13 世纪，谢赫·伊萨克 (Shaykh Isaaq) 来到索马里与迪尔索马里人通婚，其后裔成为萨马勒族系的伊萨克部落 (Isaaq)。^① 其他萨马勒族系的部落祖先也都有类似高贵的宗教出身。迪尔部落与阿拉伯人通婚使萨马勒族系地位高于萨卜族系。萨卜族系虽皈依伊斯兰教，但因缺乏联姻关系而地位较低，通常从事铁匠、皮革匠等服务性工作。^②

萨马勒族系分为迪尔、伊萨克、哈维伊和达鲁德四大部落；萨卜族系分为拉汉文 (Rahanweyn) 和迪吉尔 (Digil) 两大部落。各部落由多个氏族组成，邦特兰作为达鲁德部落聚居地，由五个氏族构成 (见图 1)。^③ 13 世纪后，人口增长导致各部落对草场与水源的需求增加，哈维伊部落和拉汉文部落逐渐向南迁徙，达鲁德部落则沿着哈维伊部落的路线迁徙，占领草场后继续将哈维伊部落向南驱赶，使他们最终南迁至肯尼亚境内。^④ 另一支达鲁德部落迁入欧加登，伊萨克部落则被驱往塔朱拉湾 (Gulf of Tadjoura)，成为索马里北方最大部落。^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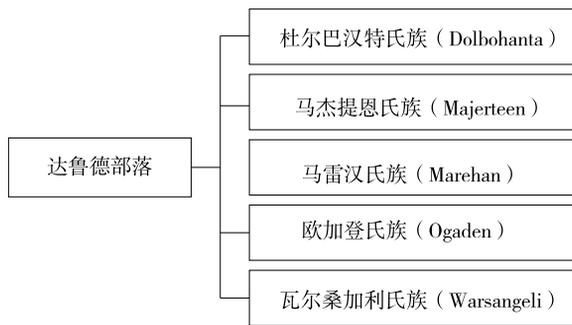


图 1 达鲁德部落氏族组成

资料来源：I. M. Lewis,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 Nation and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 - 16.

- ① [摩洛哥] M·埃尔·法西主编：《非洲通史》(第三卷)，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547 页。
- ② *A Study on Minorities in Somalia*, United Nations, 2002, p. 3; 马晓霖、梁国璇：《沙特阿拉伯的非洲之角政策：历史演变与效果评估》，《中国非洲学刊》2023 年第 4 期，第 123—136 页。
- ③ 索马里和邦特兰部落氏族划分主要参考以英国学者刘易斯和索马里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哈吉·穆赫塔尔为代表的“六大部落划分法”，这也是学界较通用的划分方式。参见 I. M. Lewis,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 Nation and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3; Mohamed Haji Mukhta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Scarecrow Press, 2003.
- ④ [以色列] 萨迪亚·图瓦尔：《索马里人》，《民族译丛》1986 年第 3 期，第 56 页。
- ⑤ Helen Chapin Metz (ed.), *Somalia: A Country Study*,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p. 35.

达鲁德部落的单一主导地位构成邦特兰地区社会认同的基础。部落根源和迁徙历史强化了达鲁德部落成员的归属认知，为共识形成筑牢情感根基。达鲁德部落的传统习俗及价值准则，如长老委员会（Guurti），经长期社会互动内化为区域普遍遵循的核心规范体系，规避了多元文化异质性引发的认同摩擦。部落内部依托传统生成的权威主体具备统一协调效能与决策合法性，以部落整体利益为行动导向整合内部诉求、调解局部分歧，有效缓解多元权力主体博弈引发的共识困境。

（二）历史经验：冲突解决与集体行动传统

前殖民时期，部落间因水源与土地争夺频发纠纷。索马里人通常通过械斗解决资源争端，胜利方占有资源。^① 但械斗代价高昂，部落也会采用习惯法解决纠纷，以确保稀缺资源共享。^② 部落长老作为秩序维护者，以长老委员会名义出面调解纠纷。为保证公正，一般由中立第三方部落长老组成委员会。^③ 他们结合实际情况与沙里亚法，提供协商环境或进行仲裁。^④ 若调解失败，传统部落氏族大会（Shir）提供更广泛参与的协商平台，其决议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基础。^⑤ 决议执行通常由获益更多方推动，必要时可诉诸武力。^⑥

殖民时期，达鲁德部落的政治主张转向一致对外，以抗击殖民者为主。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之角后，各部落在处理与外来强权关系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达鲁德部落欧加登氏族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Muhammad Abdullah Hassan）主张抗击欧洲人，获得氏族支持，于是他们联合达鲁德部落杜尔巴汉特氏族于 1899 年 8 月组建德尔维希（Dervishes）武装，发动对欧洲殖民者的“圣战”，攻击对象包括欧洲殖民者和依附英国的伊萨克部落。英国曾尝试以索马里

① [英国] A·菲德斯、C·萨尔尼多利：《肯尼亚的索马里人》，《民族译丛》1994 年第 6 期，第 63 页。

② Günther Schlee, “Customary Law and the Joys of Statelessness: Idealised Traditions Versus Somali Realities,”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7, No. 2, 2013, pp. 258 – 271; Kulow and Mohamed Malim, “Silent Cry of Somali Customary Law ‘Xe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Humanities & Education*, 2018, p. 115.

③ 王学军：《重新理解传统氏族制度：索马里国家重建的社会逻辑及其限度》，《世界民族》2020 年第 5 期，第 68 页。

④ 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A Study of Pastoralism and Politics Among the Northern Somali of the Horn of Africa*, James Currey, 1961, p. 161; Joakim Gundel and Ahmed A. Omar Dharbaxo, *The Predicament of the “Oday”: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Structures in the Security, Right, Law and Development in Somalia*, Danish Refugee Council, 2006, pp. 9 – 10.

⑤ 王学军：《传统与现代的混合——索马里兰冲突治理的历史与理论反思》，《非洲研究》2015 年第 2 卷，第 7 页。

⑥ 顾章义、安春英：《列国志：索马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4 页。

传统部落冲突调解方式解决纠纷。^① 在意大利殖民的南方地区，哈维伊、拉汉文和迪吉尔部落抵抗失败后选择与殖民政府合作，达鲁德部落因此对这些部落发起频繁袭击。^②

英国和意大利的间接统治削弱了索马里传统冲突解决机制。殖民者为节省成本，利用传统部落组织，每年召开两次咨询委员会征求部落长老意见并讨论如何解决纠纷。^③ 进入咨询委员会的长老领取殖民政府工资成为管理人员，引发部落成员反感和不满，削弱了其传统权威合法性。^④ 殖民者还随意改变传统机制，如1959年意大利政府废除拉汉文和迪吉尔部落收容其他部落成员的传统，鼓励其他部落移民保持独立身份。这瓦解了部落人口流动中的身份转换机制，阻碍部落融合，为日后更激烈的土地争夺埋下伏笔。^⑤

前殖民时期形成的以协商共识为核心的政治传统，与殖民时期跨氏族联盟的集体行动经验，共同构建了达鲁德部落重视协商、尊崇传统权威且在外部压力下高度凝聚的政治文化体系。

（三）关键教训：国家崩溃的警示

索马里独立后，不同部落争夺政权使部落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主题。哈维伊部落长期占据农牧业发达的穆杜格州（Mudug），并按部落传统世袭制任用本部落人员，达鲁德部落对此做法较为不满。二战后，哈维伊部落有影响力的人员在摩加迪沙组建并主导“索马里青年联盟”（Somali Youth League），后发展为反对意大利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政党。^⑥ 1960年，哈维伊部落亚丁·阿卜杜拉·奥斯曼·达尔（Aden Abdullah Osman Daar）凭借长期的政治积累成为索马里首任总统。他倡导团结全体索马里人的理念，却又努力确保哈维伊部落在执政党内的绝对主导地位。在1963年11月全国市政选举中，哈维伊部落代表赢得74%的席位。^⑦

达鲁德部落对哈维伊部落垄断政权和发展收益的局面极为不满，试图通过竞选实现利益重组。达鲁德部落的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Abdirashid Ali

① [英国] 刘易斯：《索马里史》，赵俊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31—75页。

② I. M. Lewis, "The Politics of the 1969 Somali Coup,"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0, No. 3, 1972, p. 392.

③ [英国]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38页。

④ A. Y. Farah and I. M. Lewis, *Somalia: The Root of Reconciliation; A Survey of Grassroots Peace Conferences in North West Somalia / Somaliland*, ActionAid, 1993, pp. 14 - 29.

⑤ [英国]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46页。

⑥ African Activists Association, *Ufaham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p. 53.

⑦ Brass Paul, *Ethnic Groups and the State*, Croom Helm, 1985, p. 35.

Shermarke) 获得意大利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资金支持, 通过选票贿赂和职位许诺获得不少部落政治势力支持。^① 在 1967 年 7 月总统选举中, 舍马克取代达尔。舍马克上台后立即着手改善本部落生存条件, 通过政府胁迫、警察殴打、商家哄骗等方式, 帮助达鲁德部落富裕人群低价收购哈维伊部落优质农田牧场, 实现财富转移。^② 在舍马克政府的 567 个职务中, 达鲁德部落占据 216 个, 哈维伊部落被挤压至 125 个, 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加起来仅获 31 个。而在 155 个政府高级职位中, 达鲁德部落占 62 个, 哈维伊部落占 36 个。^③

但是, 舍马克忽视军队重组, 军队官员中 3/4 仍出身哈维伊部落。面对军队中强大的哈维伊部落力量, 舍马克既不敢轻易替换军官, 也无暇顾忌这一问题。被排挤的达鲁德部落少数派军官组建小团体, 试图建立排除舍马克的新达鲁德部落统治集团。1969 年 10 月, 达鲁德部落出身的国民军总司令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 (Mohamed Siad Barre) 发动政变暗杀舍马克, 随后取缔多党制, 组建唯一合法政党“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 (Somali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 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④

巴雷政府延续舍马克时期偏袒达鲁德部落的政策。1969 年巴雷组建内阁, 14 位部长中 7 位来自达鲁德部落。^⑤ 农业部长、外贸部长长期被达鲁德部落垄断, 这两个领域 60% 以上的收入被达鲁德部落占有。巴雷还设立国营农场, 将非达鲁德部落的优质土地收归国有, 任命达鲁德部落成员管理。^⑥ 1974—1975 年北方大旱期间, 巴雷以救灾为借口将 14 万游牧民迁至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一带原属拉汉文部落的土地,^⑦ 打破拉汉文部落对肥沃流域的控制权。巴雷还宣扬每个索马里人都拥有权住在喜欢的地方, 为达鲁德部落任意迁徙铺路。20 世纪 80 年代, 为笼络支持者, 巴雷鼓励南部达鲁德部落军官、政客大量迁往朱巴河流域, 抢夺大量土地, 迫使拉汉文部落农民沦为佃户。^⑧ 1977—1978 年欧加登战争失败

① Abdi Ismail Samatar, *Africa's First Democrats Somalia's Aden A. Osman and Abdirazak H. Husse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4 - 175, 179.

② Alex de Waal, "The UN and Somalia's Invisible Minorities," *Cultural Survival*, March 1, 1994,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un-and-somalias-invisible-minorities>, accessed May 20, 2025.

③ Michael Walls, "The Emergence of A Somali State: Building Peace from Civil War in Somaliland," *African Affairs*, Vol. 108, No. 432, 2009, pp. 384 - 385.

④ Michael Crowd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78.

⑤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Daedalus*, Vol. 124, No. 2, 1995, pp. 107 - 132.

⑥ Alex de Waal, "The UN and Somalia's Invisible Minorities," *Cultural Survival*, March 1, 1994.

⑦ [英国] 刘易斯: 《索马里史》, 第 199 页。

⑧ Alex de Waal, "The UN and Somalia's Invisible Minorities," *Cultural Survival*, March 1, 1994.

使巴雷政权信誉扫地，达鲁德部落内部分崩离析。^①

巴雷政权的部落利己主义政策激化各部落矛盾，导致国家政权解体和达鲁德部落内部瓦解。巴雷政权将政治权力异化为单一部落牟利的工具，赢者通吃的运作逻辑导致社会撕裂、统治合法性丧失。其崩溃结局直接为邦特兰精英提供教训：忽视部落与区域的多元利益、仅服务少数精英或单一部落的权力模式，注定因失去广泛支持而走向失败。

双重战略的实践与运作

自索马里陷入部落混战、国家分裂以来，邦特兰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实体，发展出独特的双重战略。对内层面，通过共识驱动的部落权力分享机制维护稳定，核心是放弃直选，回归并改良以部落推举为基础、议会间接选举为路径的共识型政治。对外层面，以实力导向的枢纽部落角色扩大影响，核心是自治政权在联邦体系中扮演灵活的居间角色，根据自身利益时而支持联邦政府、时而制衡联邦政府。

（一）对内维度：以权力分享机制维护稳定

索马里各部落对巴雷治下达鲁德部落专权不满，便开始组织民兵武装割据自立。在此背景下，1978年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组建“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Somali Salvation Democratic Front），长期控制索马里东北邦特兰地区。1991年2月，该组织在穆杜格州击败哈伯·吉迪尔氏族的“萨阿德民兵组织”（Sa'ad），遏止法拉赫·艾迪德（Farah Aidid）北上企图。当哈维伊部落两大氏族控制摩加迪沙政权后，“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分化为军事派和文官派。军事派以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Abdullahi Yusuf Ahmed）为首，得到前巴雷政权部分军官支持；文官派以穆罕默德·阿布希尔·缪斯（Mohamed Abshir Muse）为首，代表1960年文官政府势力。^② 1991年底，军事派击败文官派，基本控制邦特兰地区，并在自治基础上保持与摩加迪沙的联系。

^① Ioan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张梦颖：《非洲之角难民问题探源及其治理困境》，《中国非洲学刊》2022年第3期，第73—88页。

^② Barry M. Rubin, *Guide to Islamist Movements*, M. E. Sharpe, 2010, p. 20; 张永蓬、刘昱函：《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及其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中国非洲学刊》2022年第3期，第89—104页。

邦特兰依托部落氏族传统组织结构，吸纳长老参与地方行政管理，实现较好治理。1992 年，优素福·艾哈迈德将盘踞在博萨索等地的“伊斯兰运动”（Al - Iihaad al - Islamiya）驱逐到南方，巩固对邦特兰的统治。遭打击的“伊斯兰运动”在南方分散融入各地伊斯兰法庭，为日后“青年党”势力崛起埋下伏笔。^① 到 1996 年底，邦特兰地区逐步走向自治，由以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为主的“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控制，有效排除南方部落武装染指的企图。

经过七年治理实践，在联合国支持下，优素福·艾哈迈德于 1998 年 7 月宣布成立索马里邦特兰国（Puntland State of Somalia），并担任首任总统。2004 年 10 月他被选为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of Somalia）总统后，达鲁德部落杜尔巴汉特氏族的穆罕默德·阿卜迪·哈希（Mohamed Abdi Hashi）继任邦特兰总统，^② 其任期内局势保持平稳。2005 年 1 月哈希卸任后，继任者是来自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奥斯曼·马哈茂德家族（Osman Mahamuud）的穆罕默德·缪斯·赫西（Mohamud Muse Hersi），他上台后继续致力于邦特兰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发展。

索马里北部最大争议地区马基尔成为考验邦特兰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该地区拥有良港拉斯戈赖（Laasgoray），内战爆发以来索马里兰与邦特兰围绕此地展开争夺。马基尔当地达鲁德部落瓦尔桑加利氏族借势保持自治。2006 年 4 月，邦特兰授权一家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勘探开发马基尔资源，引发索马里兰和马基尔方面激烈反对。^③ 2007 年 7 月，得到海外瓦尔桑加利氏族资金支持的马基尔自治州宣布独立，成立“马基尔国”，直接与国际援助机构合作，成为索马里北部第三个政治实体。^④

邦特兰拒绝承认“马基尔国”，双方围绕木炭生产原料问题反复博弈。马基尔为保护环境禁止砍伐本地金合欢树，邦特兰则追求木炭出口利润，强硬越境砍伐。^⑤ 2008 年 2 月，索马里兰部队以打击海盗为由攻入马基尔境内，与马基尔部

① Hammer Joshua, *The African Fro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07.

② *The Europa World Year Book 2005*,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 3914.

③ Omar M. Abdi & Salah Fatah, “Puntland Oil & Mining Deal: The Offspring of An Affair Between Greed and Incompetence (Part II),” *Wardheernews*, May 9, 200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715203513/http://wardheernews.com/Articles_06/may_06/09_Mineral_Deal_Omar.&_Salah.html, accessed May 25, 2025.

④ Berouk Mesf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omaliland and Its Conflict with Puntland*,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9, pp. 1 - 11.

⑤ “Tensions Build Up in Northeastern Somalia,” *Maakhir*, October 20, 2007, <https://maakhir.wordpress.com/2007/10/20/tensions-build-up-in-northeastern-somalia/>, accessed May 25, 2025.

队对峙。在邦特兰和索马里兰夹击下，“马基尔国”于2008年4月解散。^①同年8月，出身马基尔瓦尔桑加利氏族的阿卜杜拉希·艾哈迈德·贾马（Abdullahi Ahmed Jama）从美国归来参加邦特兰总统选举。他说服本氏族长老，促使马基尔加入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邦特兰。^②尽管在选举中落败，但当选总统阿布迪拉赫曼·法罗尔（Abdirahman Farole）从团结各派角度出发，任命艾哈迈德·贾马为内政部长。2009年1月，马基尔正式并入邦特兰。^③马基尔问题和平解决体现了邦特兰通过精英协商和部落推举制达成内部共识、化解冲突的治理能力。这种以权力分享为核心的机制，成功实现各主要氏族间的平衡，为地区稳定奠定基础。

（二）对外维度：以枢纽角色谋求影响

邦特兰通过复兴传统部落政治实现内部稳定，同时对联邦政府采取若即若离政策以扩大对南方各部落势力的影响。2009年1月，出身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伊萨·马哈茂德家族（Issa Mahmud）的阿布迪拉赫曼·法罗尔当选邦特兰第四任总统。他在任期内完善司法系统，建立透明财政系统，成立社会福利署，发展经济并打击海盗活动。^④

2013年，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实现向联邦政府转型。为使联邦政府更好代表各部落利益，过渡联邦政府总统谢赫·艾哈迈德（Sheikh Ahmed）积极恢复与北方各独立政权的联系，借第二届阿联酋反海盗会议（The Second UAE Counter Piracy Conference）之机，与索马里兰政府、邦特兰政府、加勒穆杜格邦政府直接对话，共同签署《迪拜宪章》（*Dubai Charter*）。邦特兰、加勒穆杜格赞同国家统一，各方以此为契机协调南北部落关系。^⑤

自1998年邦特兰宣布自治以来，政权就被达鲁德部落牢牢控制，其中马杰

① Berouk Mesf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omaliland and Its Conflict with Puntland*, pp. 1 – 11.

② “Puntland Election: General Abdullahi Ahmed Jama (Ilkajiir) for Puntland President,” Hiiraan, August 1, 2008, https://www.hiiraan.com/news2/2008/jun/puntland_election_general_abdullahi_ahmed_jama_ilkajiir_for_puntland_president.aspx, accessed May 30, 2025.

③ Berouk Mesf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omaliland and Its Conflict with Puntland*, pp. 1 – 11.

④ “Somalia: President Farole – the Pride of Puntland,” Garowe Online, May 12, 201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619122328/http://www.garoweonline.com/artman2/publish/Editorial_29/Somalia_President_Farole_the_Pride_of_Puntland_Editorial.shtml, accessed May 30, 2025.

⑤ “Mogadishu, Somaliland Sign Cooperation Deal: Report,” Agence France – Presse, June 28, 2012, <https://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i0PL7RRrZdKc0pNWPTXsJAvKB2Zw?docId=CNG.1b5f582d499ddcbe132bb7f3eb3290a8.551>, accessed May 30, 2025.

提恩氏族占据绝对优势，二十多年来，政府首脑与高级官员基本出自该氏族。2009 年上任的法罗尔本应于 2013 年 1 月届满，但因新一届政府与总统选举筹备进展缓慢，后基于邦特兰宪法追溯性原则自动延长任期一年。此举引发达鲁德部落其他氏族不满，导致博萨索、卡多（Qardho）等地民众示威游行。为平息抗议，法罗尔主动与各氏族长老协商，最终获得各方谅解，部落氏族传统制度作用得到承认与重视。

随后，马杰提恩氏族奥马尔·马哈茂德家族（Omar Mahmud）长老决定不再进行地方选举，恢复传统部落推举制确定邦特兰议会代表人选。以此为标志，邦特兰各地陆续抵制地方直选，恢复部落传统推举制。在此背景下，法罗尔解散过渡时期邦特兰选举委员会（Transitional Puntland Electoral Commission）。^① 2013 年 10 月，法罗尔宣布竞选连任，十多名其他氏族领导人也先后宣布参选。^② 选举流程变为先由各部落推举议会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举总统。2014 年 1 月，66 名新宣誓就职的推举代表在议会进行总统投票，来自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奥马尔·马哈茂德家族、曾担任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总理的阿卜杜维利·穆罕默德·阿里·盖斯（Abdiweli Mohamed Ali Gaas）以 33 票对 32 票的微弱优势击败法罗尔，成为新一届邦特兰总统。^③

阿里·盖斯在任期内推进税制改革，建立地方渔业数据库，发展渔业经济，完善交通基础设施。^④ 他利用在欧美国家的人脉，争取多国投资用于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并扩大外贸规模。^⑤ 同时，阿里·盖斯积极完善传统部落推举制下的政府治理体制，实现部落氏族利益平衡与均等化发展，创造宽松的部落推举环境。尽管加洛威（Garowe）等地发生部落氏族间冲突，但整体局势可控，外界普遍认为部落推举制和政府治理取得成功。^⑥ 在 2019 年选举中，因法罗尔与盖斯激烈竞争，第三方候选人、索马里联邦政府前规划部长、出身奥斯曼·马哈

① “Somalia: Puntland’s Puntled Polls,” Crisis Group, 2013, pp. 8 – 18.

② Malkhadir Muhumed, “Bitter Splits Ahead of Puntland Election,” Aljazeera, December 19, 2013,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13/12/19/bitter-splits-ahead-of-puntland-election>, accessed June 6, 2025.

③ “Somalia Puntland President: Abdiweli Ali Gas Beats Farole,” BBC, January 8,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651249>, accessed June 6, 2025.

④ “EU and Germany Rehabilitate Garowe – Galkacyo Corridor,” *Goobjoog News*, March 11, 2015.

⑤ “Somalia: Puntland and FAO Launch a New Safe Database for Somali Fishermen,” Horseed Media, March 27, 2014, <https://horseedmedia.net/2014/03/27/somalia-puntland-fao-launch-new-safe-database-somali-fishermen/>, accessed June 6, 2025.

⑥ Ahmed Abdirahman, “Puntland Elections in 2019: Winners and Losers!” Wardheernews, January 9, 2019, <https://wardheernews.com/puntland-elections-in-2019-winners-and-losers/>, accessed June 6, 2025.

茂德家族的赛义德·阿卜杜拉希·德尼 (Said Abdullahi Deni) 当选新一届邦特兰总统。^① 阿卜杜拉希·德尼延续阿里·盖斯的政策，加强与索马里联邦政府联系，更多参与索马里全国事务。^② 因其治下邦特兰和平发展，2024年初德尼成功连任。^③

邦特兰稳定与发展得益于双重战略的实施：对内建立以部落推举为核心的间接选举制度，有效维护内部秩序；对外以若即若离姿态处理与联邦政府关系，依托政策发展经济，逐步成为索马里北部稳定力量。这一实践体现部落传统在索马里地方治理中的核心价值，为索马里和平进程与国家整合提供参考。

双重战略的成效与挑战

邦特兰对内构建部落权力分享机制、对外扮演联邦枢纽角色的双重战略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历史经验和资源整合能力。然而，在长期运作中，邦特兰双重战略的核心优势也可能转化为风险与挑战

(一) 双重战略的成功条件及其独特性

邦特兰双重战略的成功依赖三个关键条件。首先，单一的部落社会结构是基础。邦特兰作为萨马勒族系达鲁德部落聚居地，由五大氏族组成，这一结构历经数世纪部落迁徙与整合形成。达鲁德部落成员因共同迁徙历史与同宗认知具备天然的情感共鸣，有效规避了多元认同冲突。在此基础上，达鲁德部落的传统习俗如长老议事和权威体系，经长期社会互动内化为区域治理的默认规范。长老会能快速整合五大氏族诉求、调解资源分歧，无须应对南方多部落博弈的复杂局面。这种社会共识为邦特兰权力分享机制落地提供了首要前提。

其次，历史积淀的治理经验是支撑。邦特兰稳定局面的形成依赖于对前殖民、殖民和独立后三个时期治理经验的选择性继承与反思，最终凝聚成协商优先、集体抗外、警惕专权的政治文化。前殖民时期，达鲁德部落已形成较为成熟

① 《索马里邦特兰州和平选举新政府 联合国援助团表示祝贺》，联合国官网，2019年1月9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1/1026182>，访问时间：2025年6月6日。

② “Puntland Leader Said Deni Keeps Rivals Guessing Over His Presidential Ambitions,” Africa Intelligence, July 2, 2021, <https://www.africaintelligence.com/eastern-and-southern-africa-politics/2021/07/02/puntland-leader-said-deni-keeps-rivals-guessing-over-his-presidential-ambitions,109677169-art>, accessed June 10, 2025.

③ “President of Somalia’s Puntland Region Re-elected,” The Africa Report, January 8, 2024,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332366/president-of-somalias-puntland-region-re-elected/>, accessed June 10, 2025.

的矛盾化解机制：轻度纠纷由中立第三方部落长老组成的长老委员会仲裁，结合习惯法与沙里亚法提出解决方案；纠纷升级则召开氏族大会，以更广泛参与度确保共识最大化，而且大会决议具备不可抗拒的执行依据。殖民时期，达鲁德部落展现跨氏族联盟凝聚力，如欧加登氏族组建德尔维希武装联合杜尔巴汉特氏族共同抗击欧洲殖民者。^① 独立后，巴雷政权的部落利己主义为邦特兰精英提供警示，使其认识到忽视多元利益必致失败，这也是后来邦特兰推行氏族权力平衡和部落推举制的直接动因。

再次，有效的资源整合能力是保障。邦特兰战略的成功还依赖对内外资源的精准整合，既避免联邦政府依赖援助却无治理的困境，也规避索马里兰相对独立却遭国际孤立的局限。对内邦特兰将传统制度与现代治理融合，将部落传统转化为治理工具。2014 年总统选举中的微弱胜选，2019 年德尼因前两位候选人竞争激烈而获胜，均体现氏族利益均衡设计。同时，邦特兰在传统框架下引入现代治理元素，如法罗尔任期建立透明公共财政、社会福利署，盖斯任期搭建渔业数据库、推进税制改革，实现传统权威保障稳定与现代制度提升效能的互补。对外邦特兰以名义联邦、实质自治为定位，灵活拓展外部空间，实现非对称外交与功能合作的突破。安全上与美国、阿联酋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外交上积极与外部国家建立联系、开展合作，避免索马里兰的外交困境。

邦特兰与索马里兰同为索马里动荡局势中的稳定孤岛，但二者的治理路径存在本质差异，这源于双方在政治定位、权力合法性与区域互动逻辑等方面的根本区别。邦特兰采取实质自治、名义联邦的政治定位，1998 年成立索马里邦特兰国，明确宣布不脱离索马里联邦框架，仅追求高度自治。2012 年以来加强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参与全国事务，即便 2024 年联邦政府收权引发抵制，邦特兰也未寻求独立，仅以联邦枢纽角色协调地方与中央矛盾。而索马里兰采取完全独立、脱离联邦的政治定位，1991 年原英属索马里兰地区脱离索马里独立，成立索马里兰共和国，拒绝承认任何索马里联邦政府权威，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删除索马里标识，将独立建国作为核心政治叙事。

在权力合法性来源方面，邦特兰依托部落内部共识与联邦的名义认可，其合法性通过达鲁德部落五大氏族的协商共识获得，通过部落推举制确保氏族利益平衡，同时借助联邦成员身份获得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间接认可，兼获内部部落授权与外部联邦背书。索马里兰则依赖单一部落叙事与自主公民授权，通过伊萨克部落的独立抗争史获得合法性，通过公民投票强化独立合法性，拒绝任何

^① 崔媛媛、王涛：《英国对非洲投资的历程、现状及启示》，《学术探索》2023 年第 1 期，第 53—55 页。

联邦层面授权。因未获国际承认，其合法性仅局限于内部部落认同，缺乏外部权威背书，导致国际援助规模远低于邦特兰。

在区域互动逻辑上，邦特兰采取协同联邦、整合区域的策略，以联邦枢纽身份协调南北关系。一方面通过反恐合作与经济投资巩固自身稳定；另一方面推动区域整合，如2009年通过氏族协商吸纳马基尔地区，2012年签署《迪拜宪章》协调南北部落矛盾，呈现出以自治促协同的逻辑。索马里兰则采取对抗联邦、争夺区域策略，对联邦政府采取零合作态度，同时与邦特兰争夺战略要地马基尔，呈现出以独立拒协同、以对抗争资源的逻辑。

在经济与安全基础上，邦特兰形成内生韧性与外部合作相结合的格局，经济依托渔业、跨境畜牧业等本土产业，辅以国际投资，抗风险能力较强；安全上通过社区警务与美国情报支持实现双重保障，既化解内部的海盗问题，又抵御外部“青年党”渗透，形成以内生稳定为主、外部支持为辅的格局。索马里兰则形成内部自给与外部孤立相并存格局，经济依赖北部港口柏培拉港的转口贸易，因国际承认的缺失而难以获得大规模外资；安全上仅依赖伊萨克部落民兵，缺乏外部反恐合作，虽无“青年党”大规模渗透，但内部部落矛盾仍存隐患。

（二）双重战略的内在风险与潜在挑战

邦特兰双重战略虽已实现稳定，但在长期运作中，其核心优势也可能转化为风险与挑战。首先，部落推举制导致精英固化与民主赤字。邦特兰部落推举制虽规避了直选引发的部落冲突，却也形成马杰提恩氏族主导、少数精英垄断的治理格局，民主参与的渠道逐渐狭窄，长期而言可能引发底层不满与氏族矛盾。从权力结构看，邦特兰政权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由达鲁德部落马杰提恩氏族掌控。2013年法罗尔因选举筹备缓慢而延长任期时，博萨索、卡多等地民众爆发示威，本质上是对马杰提恩精英垄断权力的不满。2014年总统选举中，66名推举代表仅以1票的差距决出胜负，反映出精英圈层内部博弈远胜广泛的民意表达。普通民众既无直选权，也难以影响氏族所推举的代表人选，导致治理决策更倾向于精英利益。更严重的是，精英固化已形成制度性障碍。2013年法罗尔解散过渡选举委员会并恢复部落推举制后，地方直选被全面抵制，民主机制进一步倒退。相比之下，索马里兰虽未获国际承认，但至少通过公民投票与地方议会直选扩大参与，邦特兰的精英协商本质上是部落寡头政治，若长期忽视底层诉求，可能重蹈巴雷政权精英脱离民众的覆辙。南部“青年党”正是利用底层的不满而扩张，邦特兰若不能破解精英固化的局面，未来或面临类似极端主义渗透风险。^①

^①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71—88页。

其次，单一部落结构导致社会包容性不足。邦特兰稳定建立在达鲁德部落单一主导基础上，这种结构虽规避多元冲突，却导致达鲁德部落内部弱势氏族的利益边缘化，社会包容性严重不足，为长期冲突埋下隐患。马杰提恩氏族主导政权，杜尔巴汉特、瓦尔桑加利、欧加登、马雷汉四大氏族的利益诉求常被忽视。瓦尔桑加利氏族虽获得内政部长职位，但在石油勘探与渔业资源分配中仍处于弱势，其聚居地的资源主要由邦特兰政府管理。欧加登氏族部分成员居住在边境地区，跨境畜牧业贸易常因邦特兰与埃塞俄比亚的外交矛盾而受损，但邦特兰政府未给予足够补偿，氏族间的利益失衡可能在未来激化。

再次，对外部势力的依赖导致稳定格局脆弱。邦特兰稳定高度依赖外部安全、经济与外交支持，而且缺乏替代方案，一旦外部势力调整政策，其治理体系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邦特兰地区获得美国的反恐支持，但这种合作具有极强的外部主导性特征。若美国因非洲之角战略调整削减对邦特兰的支持，其反恐能力将大幅下降。南部“青年党”正是利用地方反恐能力薄弱而扩张，邦特兰若失去美国情报支持，“青年党”可能通过欧加登等边境地区渗透，甚至联合不满的氏族引发动荡。此外，邦特兰将海盗纳入警务的做法，本质上是利益收买，若外部援助减少导致警务经费不足，海盗问题可能复燃，从而破坏渔业出口与海上安全。

邦特兰的自给型经济圈虽优于联邦政府，但仍高度依赖国际投资与外部市场。渔业产品大量销往海湾阿拉伯国家，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和资源投资大量倚赖欧盟、阿联酋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组织。若外部环境变化，海湾国家因能源危机减少对渔业产品的进口，或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因勘探收益不足而撤资，邦特兰经济将面临重创。^① 2025 年美国削减联邦援助的案例已证明外部援助的不可靠性，邦特兰若不能降低对国际投资的依赖程度，经济韧性将难以持续。

邦特兰的外交空间依托于联邦成员身份与稳定支点定位，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本质上将邦特兰视为索马里联邦制改革的实验田。若未来联邦政府与邦特兰之间爆发权力冲突，国际组织可能为维护索马里统一而倾向于联邦政府，从而压缩邦特兰的外交空间。此外，欧盟、美国可能以支持邦特兰为条件，要求其配合它们的政策，如接收索马里难民、参与对“青年党”的军事打击，若邦特兰拒绝，可能失去外部支持。这种条件性认可让邦特兰的外交自主性受限，难以完全根据自身利益制定政策。

最后，与联邦政府的权力博弈导致平衡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邦特兰实质自治、名义联邦的平衡状态，本质上是联邦政府无力治理的暂时结果。随着联邦政

^① 王涛、崔媛媛：《非洲风能开发利用的潜能、现状及前景》，《中国非洲学刊》2020 年第 2 期，第 117—136 页。

府试图强化中央集权，二者的权力冲突将逐渐激化，威胁邦特兰自治地位。未来若联邦政府在外部支持下强化集权可能进一步要求收回资源管控权并干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邦特兰的实质自治地位。此外，联邦政府与南方哈维伊部落的潜在合作，也可能挤压邦特兰生存发展空间。哈维伊部落长期控制摩加迪沙，若联邦政府与哈维伊部落达成权力共享协议，可能联合推动削弱地方自治政策，以巩固南部势力。在南北对立的格局下，邦特兰可能被迫放弃名义联邦身份，转向完全独立，但这又将面临类似索马里兰的国际孤立风险。这种要么妥协、要么对抗的困境，正是邦特兰与联邦政府之间博弈的长期不确定性所在。

结 语

邦特兰能够在索马里全境治理崩溃、恐怖主义蔓延与部落冲突频发的困境中成为稳定孤岛，核心在于对内构建部落权力分享机制、对外扮演联邦枢纽角色的双重战略。这一战略植根于其独特的社会基础、历史积淀与资源整合能力。从社会基础看，达鲁德部落单一主导结构规避了多元认同冲突。从历史经验看，邦特兰对前殖民、殖民与独立后三个时期的治理经验进行了选择性继承与反思。从资源整合看，邦特兰对内融合传统与现代治理，通过现代制度提升治理效能；对外以名义联邦、实质自治定位灵活破局，既与美国、阿联酋合作打击恐怖组织以保障安全，又通过欧盟投资发展渔业、与澳大利亚矿业合作开发资源，构建自给经济圈，跳出了联邦政府依赖国际援助以及索马里兰宣布独立却遭国际孤立的双重陷阱。

邦特兰的双重战略为索马里其他地区及全球冲突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理范式。在索马里内部，其核心启示在于建立包容性权力分配机制：南部与中部可借鉴邦特兰的部落协商模式，通过长老会议实现氏族间权力均衡，避免因单一部落垄断政权而引发对抗。联邦政府则需从邦特兰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中汲取经验，认识到地方自治权与中央集权之间需保持动态平衡，强行收权只会激化矛盾。对全球冲突地区而言，邦特兰经验揭示了两个关键治理原则：其一是传统制度现代化转型的可行性，邦特兰将长老议事制转化为现代权力分享机制，证明本土治理资源可通过创造性转化适应现代治理需求，这一模式在非洲部落社会具有普适参考价值；其二是务实外交策略的重要性，邦特兰既不追求完全独立而避免国际孤立，也不盲目依附外部援助，而是以联邦成员身份灵活开展国际合作，在保持实质自治的同时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这种不完全独立却保持自主的生存智慧，为全球非国家行为体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谋求发展空间提供新思路。

（责任编辑：贺杨）

translation, identity recognition translation, and network power translation, Indian businessmen build bridges betwe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system,” achieving the local embedding of their economic power. The centraliza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core families,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and continuous negotiation between Indians, the state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jointly shape the power structure. Consequently, Indian capital can act as a positive force for Tanzania’s economy, yet it may also foster exclusion in context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rust deficits, revealing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Keywords: Tanzania, Indian merchants,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power, cross – cultural interaction

Authors: Yang Chongsheng,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Xiong Xinghan,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en Zeyu, Ph. 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onsensus and Contestation: The Dual Pathway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omalia’s Puntland

Cui Yuanyu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verall instability in Somalia, the Puntland region has emerged as an “island of stability,” whose development path holds unique research value.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Puntland’s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external strategies reveals that its stability stems from the systematic practice of a dual strategy. Internally, it has constructed a model of consensus politics, grounded in clan – based selection and operationalized through indirect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is system balances clan interests and resolves internal conflicts via power – sharing mechanisms. Externally, Puntland acts as a strategic actor within the federal framework, employing strategies of cooperation and balancing to safeguard its autonomy and expand its regional influenc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Puntland’s dual strategy lies in its single – tribe – dominated social structure, historically accumulated governance experience, and pragmatic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However, Puntland’s developmen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elite solidification, insufficient social inclusiveness, and uncertainties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 Puntland’s governance practice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local stability in Somalia, and its experience offers a governance path that

can be referenced by regions deeply troubled by governance failures and conflicts.

Keywords: Somalia, Puntland, tribal politics, power – sharing, political governance

Author: Cui Yuanyuan, Lecturer of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nzania’s Civil Service Salary System: Dynamic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Sun Jin, Xu Xiuli and Wu Jin

Abstract: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often viewed as a simplistic binary of external pressure versus local response, but this perspective fails to explain why similar reform pressures yield divergent institutional paths.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actual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not a simple confrontation,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norms, local capabilities, and domestic gaming. In this interactive process, national elites do not passively accept or reject external norms, but strategically integrate them through the use of intermed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combine ambiguity and resilience, thus forming a unique hybrid governance model.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anzania’s civil service salary system,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it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has undergone a dynamic transition through four stages: negotiation and adjustment, formal adoption, selective embedding, and autonomous adjustment.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e allowance system, as a core intermediate institution, sequentially acted as a mobilizer, a buffer, a converter, and a balancer. This evolutionary pathwa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cyclical fluctuations in administrative incentives, a dual – track logic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ere superficial compliance coexists with deep – seated autonomy, and a pattern of asymmetric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coexis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tructural stability. The central im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s that adaptive governance and hybrid models are inherent logics with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ing the authentic local institutional operating mechanisms is a key prerequisite for building mor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Keywords: Tanzania, civil service salary system, composite power structure, national governance

Authors: Sun Jin,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